

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 2013—2015 年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 国 洪

文章以 2013—2015 年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扩展的明瑟收入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有序 Logit 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主观经济评价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劳动与非农劳动间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别,表明民族地区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农村居民外出就业能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显著低于汉族居民,其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大部分农村居民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稳步提升,并对未来自家经济状况保持乐观的心态,而外出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文章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上限,而人力资本能否从低收益的行业或地区流入到高收益的行业或地区,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政府在继续提升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

关键词:民族地区 人力资本 外出就业 农村居民收入

作者王国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2617。

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逐年稳步提高,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依然存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还比较低,依然制约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2017 年民族八省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442 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3210 元,年均增长 9.62%;贫困人口规模为 1032 万人,约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的 1/3。^① 影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多,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影响。人力资本作为居民个人收入增长的内生要素,其通过提高居民个人的劳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编号:13@ZH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与贫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6M5913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乐长虹:《奋力推进民族经济工作迈进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 http://www.seac.gov.cn/art/2017/12/25/art_32_297079.html, 2017 年 12 月 25 日。

生产率,以实现提高居民收入的目的。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往往需要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因此,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是实现其劳动生产率转化的重要途径和基础。随着我国户籍制度壁垒逐渐被打破,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工作。人力资本积累和外出就业作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对于缓解民族地区的贫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否如期脱贫,直接关系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教育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教育对个体劳动生产力的促进程度;二是个体的劳动生产力是否得以充分发挥。个体劳动生产力决定了教育的最高收益率,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个体劳动生产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赖德胜认为,教育回报率的高低除了受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外,还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① 诺森韦格(Rosenzweig)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均影响教育的收益率。^② 边燕杰等也认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就越大。^③ 大部分学者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对居民的收入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来自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结论提供了直接证据。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等对20世纪中后期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研究,得出世界平均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7.5%,亚洲国家为9.9%,拉丁美洲为12%。然而,中国同一时期教育收益率显著低于9.7%的世界平均水平。^④ 艾伦(Alan)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很少超过5%,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4%。^⑤ 侯风云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为3.7%。^⑥ 陈玉宇和邢春冰运用Heckman模型对1991—1997年我国农村教育收益率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农村地区教育的工资回报率介于0—5%之间,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教育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工业部门工作,从而会带来约5—7%的回报率。^⑦ 孟大虎等研究得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且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教育收益率越低。^⑧ 李兴绪和刘曼莉认为,包括教育年限在内的农户人力资本质量对边境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

① 参见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② 参见M. Rosenzweig,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2, 1995.

③ 参见Bian Yanjie and J. R.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5, 1996.

④ 参见George Psacharopoulos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2, No. 9, 1994.

⑤ 参见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教育回报率的一致性》,《中国劳动经济学》2009年第1期。

⑥ 参见侯风云:《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⑦ 参见陈玉宇、邢春冰:《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⑧ 参见孟大虎、苏丽锋、赖德胜:《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负向影响。^① 谭灵芝和孙奎立以南疆为研究对象,得出民族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机会的获得对中低收入者有显著影响,且南疆地区收入流动性具有较强的代际传递特征。^②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尤其是效率工资理论被提出后,很多学者试图研究身体健康状况和营养摄入对个体收入提高的影响。^③ 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营养和健康能显著提高劳动者个体的收入水平。^④ 国内关于健康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张车伟率先运用家庭生产函数,研究营养摄入、体质特征、疾病、自我评价的身体状况和日常活动能力指数等多种健康指标对贫困地区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得出健康对种植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⑤ 魏众利用 1993 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个体收入的影响,认为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均有显著的影响,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及增加家庭收入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⑥ 王弟海认为,农户身体的健康状况对其收入有较大的影响,健康的身体可以避免农户陷入贫困。^⑦ 秦立建等使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 2003—2007 年的调查数据,运用 Heckman 模型研究健康对外出就业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健康状况较差农民工的收入仅为健康状况较好农民工收入的 63%。^⑧ 程名望等运用 2003—2010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得出健康与教育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主要得益于农户收入的增加,且健康比教育更有利于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⑨

劳动力的转移对家庭收入及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发展经济学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⑩ 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卢卡斯(Lucas)和斯塔克(Stark)通过对博茨瓦纳的研究,得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可以缓解农户家庭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促进外出就业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⑪ 亚当斯(Adams)对巴

① 参见李兴绪、刘曼莉:《边境民族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以云南红河州农户为例》,《数理统计与管理》2011 年第 4 期。

② 参见谭灵芝、孙奎立:《民族地区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南疆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7 年第 1 期。

③ 参见 C. T. Davies, "Relationship of Maximum Aerobic Power Output to Productivity and Absenteeism of East African Sugar Cane Worker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Vol. 30, No. 2, 1973; G. B. Spurr, M. Barac-Nieto, M. G. Maksud, "Productivity and Maximal Oxygen Consumption in Sugar Cane Cutt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Vol. 30, No. 3, 1977。

④ 参见 J. Strauss, "Does Better Nutrition Raise Farm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2, 1986; A. Foster and M. R. Rosenzweig, "A Test for Moral Hazard in the Labor Market: Effort, Health and Calorie Consump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6, No. 2, 1994; A. Deaton, "Health,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1, 2003。

⑤ 参见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经济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⑥ 参见魏众:《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经济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⑦ 参见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经济研究》2012 年第 6 期。

⑧ 参见秦立建、陈波、秦雪征:《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3 年第 6 期。

⑨ 参见程名望、Jin Yanhong、盖庆恩、史清华:《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1 期。

⑩ 参见 O. Stark and D. E.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1985。

⑪ 参见 R. Lucas and O. Stark,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No. 5, 1985。

基斯坦的研究也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资产性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① 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以缓解家庭信贷资金约束,从而促进农村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② 王小龙和兰永生运用 CHNS 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力地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③ 王子成运用 2006 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得出,在考虑劳动力外出务工前后家庭人口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提高了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④ 然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出,劳动力迁移不但不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农村经济造成负向影响。如森迪(Sindi)等利用肯尼亚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会对输出地农作物产量及农业总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获得的收入无法补偿农业总收入和农作物产量减少的损失。^⑤ 苑会娜运用北京城八区农民工调查数据,得出进城务工人员短期收入的提高是以延长工作时间和损耗身体健康为代价,长期不利于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⑥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转移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等均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但由于研究的地区、时间点和数据来源不同,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纵观现有文献,至少存在如下改进空间:一是以往的文献多考虑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健康及外出就业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两个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将人力资本和外出就业同时引入模型中,使得模型可能遗漏了关键变量,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二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以往的研究多按东、中、西部进行划分,很少有研究聚焦于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农村。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略有贡献:一是将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教育、健康和外出就业因素同时引入模型,防止模型中主要变量的遗漏,并对工作经验、性别、家庭规模、政治身份、民族成份等因素进行了控制,使得参数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二是数据采用面访式搜集,数据质量较高。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3—2015 年度城乡调查问卷,所有问卷均采用面访式完成,保证了问卷的质量。三是聚焦于民族地区农村,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以期为民族地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择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① 参见 R. H. J. Adams, “Remittances, Investment and Rural Asset Accumulation in Pakis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1, 1998.

② 参见 T. J. Eaylor, S. Rozelle, A. D. Brauw,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1, 2003.

③ 参见王小龙、兰永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冲击及财政政策含义》,《财贸经济》2010 年第 12 期。

④ 参见王子成:《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 年第 4 期。

⑤ 参见 K. Sindi and L. Kirimi, “A Test of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Rural Kenya,” Paper Submitted to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Long Beach, 2006.

⑥ 参见苑会娜:《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管理世界》2009 年第 5 期。

“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3—2015 年度城乡调查问卷。本次调查旨在了解 21 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主要挑战,调查地点以民族地区的县为基本单位,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与小康社会建设情况、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公共服务提供情况等进行了调查。为了使问卷具有代表性,在抽样时采取随机抽样原则,并对同一地区城市和农村调查问卷的比例进行了控制,2013—2015 年共收回城乡调查问卷 18,392 份,去除收入明显失真的数据后,共保留有效样本 15,249 份。“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与“CHARS”数据、“千村调查”数据及其他数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聚焦民族地区,调查的区域均为民族自治县。二是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次调查覆盖 57 个民族自治县,约占我国民族自治县的 50%,其数据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三是调查问卷全部采用面访式完成,问卷的质量较高。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收入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个人的年收入,根据不同年份,以 2013 年为基期,对不同年份农村居民个人的收入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相关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如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1)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两个主要变量,一是居民的教育年限;二是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将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及研究生 7 类。根据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分别将其转化为受教育年限:未上学为 1 年,小学为 6 年,初中为 9 年,高中为 12 年,大专为 15 年,大学本科为 16 年,研究生为 19 年。从表 1 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10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 6 年,而同一时期全国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 9.12 年。这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民族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均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通过提高居民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其增加收入的目的。此外,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教育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从而间接提高居民个体的收入。因此,预计教育年限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为正。2013 年的调查问卷将居民的健康状况分为 5 类,分别为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长期慢性病但不太影响工作和生活、长期慢性病且影响正常工作或生活;2014—2015 年的调查问卷将居民的健康状况分为 3 类,分别为健康、一般和不健康。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将 2013 年居民健康状况合并为健康、一般和不健康,其中将原始数据的很健康和比较健康合并为健康,身体一般的不做变换,长期慢性病但不太影响工作和生活及长期慢性病且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合并为不健康。即 2013—2015 年居民的健康被归为三类,即健康、一般和不健康。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身体健康程度应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2)外出就业。本文所指的外出就业是指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去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工作。考虑到学生、家务劳动者等类别人员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故将民族地区农村就业人员分为 4 类,分别为一直务农,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一直从事非农工作和其他无收入人员。2014 年问卷中的家务劳动者、退休人员、全日制学生等不工作人员统一划归为其他无收入人员。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二是从事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下,劳动者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之间应无明显的收入差别。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直存在,一直务农人员的收入一般低于非农就业人员,因此,预计民族地区农村一直务农人员的收入较低,一直从事非农就业人员的收入较高,而既务农也从事非农就业人员的收入应介于两者之间。

(3)普通话的掌握程度。2013—2015年调查问卷将被访者的普通话程度分为7级,分别为能流利准确地使用、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能听懂但不太熟练、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和听不懂也不会说。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以上7类归为如下3类,即将能流利准确地使用、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和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归为能听懂,也会说;将能听懂但不太熟练和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归为能听懂,但不会说;将听不懂也不会说归为一类。在外出就业的过程中,语言对劳动者能否就业及就业后收入的高低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预计农村居民的普通话越好,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其收入水平也越高。

(4)工作经验。用居民参加工作的年限来代表工作经验。调查问卷中没有工作经验这一问题,但可以根据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计算。本文通过农村居民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来估算工作年限,首先将农村居民按学历分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两类。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个体,读完初中的年龄一般为15岁(6岁入学加上6年小学,再加上3年初中),我国规定的劳动年限阶段应大于等于16年,故其工作年限等于年龄减去16岁;对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个体,其工作年限等于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入学年龄(统一取6岁)。对于60岁以上的人员,在计算工作年限时统一按60岁计算。从表1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村被访问者的平均年龄为44.33岁,年龄的中位数为44岁;平均参加工作年限为26.89年,参加工作年限的中位数为27年。本文预计工作年限与收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农村居民从参加工作到一定年龄阶段,其收入水平与工作经验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精力和体力下降,收入也将有所下降。

(5)性别与政治面貌。从被访者的性别比例来看,男性占总样本量的63.65%,女性占总样本量的36.35%,男性受访者的样本量大于女性样本量,在控制性别变量时,令男性为1,女性为2。从不同性别人员收入的中位数来看,男性收入的中位数大于女性收入的中位数;从收入的标准差来看,女性收入的标准差约为男性收入标准差的6倍。据此可以推断,大部分男性的收入高于女性,部分被访女性的收入较高,且被访女性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本文将政治面貌分为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两类,令中共党员为1,非中共党员为2,其中,中共党员占样本总量的13.55%,非中共党员占样本总量的86.45%。从不同政治面貌人员收入的分布来看,中共党员收入的平均数和收入的中位数均大于非中共党员,且中共党员收入的标准差小于非中共党员收入的标准差。据此可以推断,与中共党员相比,非中共党员的收入应低于中共党员的收入,且中共党员间的收入差距小于非中共党员间的收入差距。

(6)民族成份与家庭规模。调查问卷中将被访者的民族成份分为56个民族,但由于大多数民族样本量相对较少,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相对准确性,故将民族成份合并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参数估计时,令汉族为1,少数民族为2。从样本分布来看,汉族占样本总量的22.72%,少数民族占样本总量的77.28%。从不同民族的收入分布来看,民族地区农村汉族居民收入的平均数为38,072元/年,高于少数民族居民收入的平均数24,017元/年;从收入的中位数来看,汉族居民收入的中位数约是少数民族居民收入中位数的2倍;从收入的标准差来看,汉族居民收入的标准差约为少数民族居民收入标准差的1/3。据此可以推断,民族成份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影响。家庭规模用家庭人口数来衡量,民族地区农村家庭人口数平均为4.46人,中位数为4人。家庭规模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是双向的,当家庭人口中劳动力人口相对较多时,家庭规模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为正;当家庭人口中劳动力人口

相对较少时,即家庭抚养比相对较高时,家庭规模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应为负。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解释	样本量	占样本的比例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收 入	个体的收入	3046	100.00%	27210	12000	186585
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	9730	100.00%	7.10	6.00	3.94
身体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	2263	74.51%	26435	14333	51859
	身体一般	465	15.31%	19849	11467	24344
	身体不健康	309	10.17%	44106	7000	568468
外出就业	一直务农	1225	45.61%	13210	8000	17657
	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	936	34.85%	27255	15000	56945
	一直从事非农工作	525	19.55%	39482	23889	69595
普通话的掌握程度	能听懂,也会说	1630	72.83%	29905	19493	57226
	能听懂,但不会说	467	20.87%	20278	10000	36749
	听不懂,也不会说	141	6.30%	81177	10000	841326
年 龄	年 龄	9739	100.00%	44.33	44.00	16.70
工作经验	参加工作年限	9690	100.00%	26.89	27.00	12.11
性 别	男 性	1935	63.65%	26627	13000	52142
	女 性	1105	36.35%	28244	10000	302087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409	13.55%	31941	20000	44225
	非中共党员	2609	86.45%	26105	10000	199907
民 族	汉 族	692	22.72%	38072	20000	64973
	少数民族	2354	77.28%	24017	10000	209207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	9690	100.00%	4.46	4.00	2.07

注:教育年限、年龄和工作年限变量对应的单位为年,家庭规模变量对应的单位为人,其余变量对应的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均为收入,其单位为元。

(二)模型设定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均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对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外出就业作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获得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无疑会对他们的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居民的年龄、性别、民族成份、家庭规模等因素均可能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前文的指标选择,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Y_i) = \alpha_0 + \alpha_1 \text{HEL}_i + \alpha_2 \text{EDU}_i + \alpha_3 \text{MAINF}_i + \alpha_4 \text{LAUG}_i + \alpha_i X_i + \epsilon_i$$

在上式中, Y_i 表示民族地区第 i 个农村居民的收入, HEL_i 表示民族地区第 i 个农村居民身体的健康状况, EDU_i 表示居民的受教育年限, MAINF_i 表示民族地区第 i 个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情况, LAUG_i 表示民族地区第 i 个农村居民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 X_i 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性别、政治面貌、民族成份和家庭规模, ϵ_i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

将相关数据代入模型中,借助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结

果表明,除工作经验与工作经验的平方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外,其他变量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当删去变量工作经验的平方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随之消失。由于本文并不对工作经验的平方对应的参数进行解释,故可以不对其进行处理。本文运用 STATA13.0 软件对相关参数进行了估计,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文章采取了逐步增加自变量的方法,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

变量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教育年限	0.0592*** (0.0070)	0.0639*** (0.0076)	0.0592*** (0.0077)	0.0570*** (0.0078)	0.0560*** (0.0078)
一般(对照组:身体健康)	-0.2656*** (0.0679)	-0.2730*** (0.0680)	-0.2671*** (0.0679)	-0.2171*** (0.0676)	-0.2224*** (0.0672)
不健康(对照组:身体健康)	-0.4687*** (0.0815)	-0.4257*** (0.0823)	-0.4143*** (0.0821)	-0.4115*** (0.0816)	-0.4294*** (0.0816)
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 (对照组:一直务农)	0.4132*** (0.0557)	0.3826*** (0.0558)	0.3697*** (0.0558)	0.3180*** (0.0556)	0.3349*** (0.0555)
一直从事非农工作 (对照组:一直务农)	0.7424*** (0.0702)	0.7440*** (0.0705)	0.7611*** (0.0707)	0.6214*** (0.0721)	0.6187*** (0.0716)
能听懂,但不会说 (对照组:能听懂,也会说)	-0.1076* (0.0595)	-0.1020* (0.0593)	-0.1111* (0.0593)	-0.1253** (0.0588)	-0.1198** (0.0584)
听不懂,也不会说 (对照组:能听懂,也会说)	-0.3369*** (0.0986)	-0.3492*** (0.0981)	-0.3522*** (0.0978)	-0.2774*** (0.0972)	-0.2968*** (0.0967)
工作经验		0.0419*** (0.0085)	0.0398*** (0.0085)	0.0410*** (0.0084)	0.0390*** (0.0084)
工作经验的平方		-0.0009*** (0.0002)	-0.0008*** (0.0002)	-0.0009*** (0.0002)	-0.0009*** (0.0002)
性别(对照组:男性)			-0.1922*** (0.0498)	-0.1786*** (0.0496)	-0.1906*** (0.0493)
政治面貌(对照组:中共党员)				-0.0805 (0.0690)	-0.0916 (0.0686)
民族(对照组:汉族)				-0.4157*** (0.0585)	-0.3651*** (0.0588)
家庭规模					-0.0827*** (0.0134)
常数项	8.8011*** (0.0718)	8.3713*** (0.1390)	8.7182*** (0.1652)	9.6769*** (0.2526)	10.0168*** (0.2557)
Adj-R ²	0.1768	0.1885	0.1943	0.2111	0.2255
F 检验值	55.75	48.16	45.42	42.37	42.56
样本量	2040	2031	2027	2011	1999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对应的标准差。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积累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教育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居民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将增加5.6%。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教育的收益率明显低于我国整体的教育收益率,李实和丁赛估算出我国1999年的教育收益率为8.4%,^①孙志军运用2005年全国1%抽样人口的双胞胎数据,估计出我国教育的明瑟收益率约为14%。^②

而劳动收入与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紧密相关,在其他技能相近的情况下,身体状况较好的人,其劳动生产率往往较高,收入相应较高;身体状况较差的人,其劳动生产率往往较低,收入也相应较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自我感觉身体状况一般的居民的收入比自我感觉身体健康的居民的收入低22.24%,自我感觉身体不健康的居民的收入比自我感觉身体健康的居民的收入低42.94%。这表明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与身体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资本积累相对有限,其收入更多依靠劳动收入。

因此,总的来看,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偏低。其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是民族地区农村教育质量相对较差,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硬件和教师整体水平均低于民族地区城镇,与我国发达地区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则更大;二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现象,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三是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受自身能力和金融信贷方面的限制,其获取有效劳动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鉴于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硬件的投入,同时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以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的教育质量。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增加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居民多投资于教育,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教育的边际收益率。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外出就业能显著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工作有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民族地区农村一直务农的居民相比,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务农的居民的收入高33.49%,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比一直务农的居民的收入高61.87%。这表明在民族地区的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别,即民族地区农村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依然存在,农村的劳动力还存在一定的剩余,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外出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据此可以推断,民族地区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

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而言,与外界进行沟通的能力将影响其是否外出就业,问卷用被访人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来衡量其与外界沟通的能力。从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能听懂、也会说普通话的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相比,能听懂、但不会说普通话的居民的收入要低11.98%,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的居民的收入要低29.68%。

工作经验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刚参加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其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其收入将增加3.9%;随着居民年龄的进一步增加,其精力和体力等进一步下降,其收入会出现轻微的下降。

① 参见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② 参见孙志军:《基于双胞胎数据的教育收益率估计》,《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

这一结论与预期是一致的,居民在年轻时精力和体力较好,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其劳动生产率无疑会有所提高,故其收入将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当居民的年龄达到一定阶段后,劳动者的体力和精力等将下降,其劳动生产率将有所下降,故其收入也将会出现小幅下滑。

从性别变量来看,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与男性相比,民族地区农村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 19.06%,这一结论与李实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类似。^① 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居民的收入低于男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内部分工造成的,女性更多承担照顾老人和小孩等家务劳动,而男性更多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政治面貌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民族成份来看,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显著低于汉族,与民族地区农村的汉族居民相比,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比汉族居民的收入低 36.51%。其可能的原因:一是民族地区汉族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少数民族。从被调查地区的农村来看,汉族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13 年,而少数民族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8 年;从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来看,汉族居民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 9 年,而少数民族居民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 6 年。二是少数民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从收入的标准差可以看出,汉族居民收入的标准差约为少数民族居民收入标准差的 1/3。从家庭规模变量来看,家庭规模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家庭人口每增加 1 人,居民的收入将减少 8.27%。这可能是由于家庭人口越多,越需要居民花时间去照顾家人,即家务劳动的时间增加了,而工作的时间相应有所减少,从而形成家庭规模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二)基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分位数回归

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本文接下来运用分位数回归技术,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等变量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随收入分布变化而变化,相比较而言,收入处于 5%、25% 和 50% 的居民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分别为 6.74%、7.12% 和 6.52%;而收入处于 75% 和 95% 的居民的收益率相对较低,分别为 4.88% 和 3.84%。这表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更加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教育有利于缩小民族地区农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无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如何,其身体的健康状况对其收入均有正向的影响。从影响系数来看,收入处于最低 5% 的居民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最大,与身体健康的居民相比,身体状况一般的居民比身体健康的居民收入少 42.04%;而收入处于 25%、50% 和 75% 的身体状况一般的居民的收入分别比身体健康的居民的收入低 17.94%、19.19% 和 17.17%。对于身体不健康的居民,其身体状况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收入较低的居民,其身体健康状况对其边际收入的影响较大;收入较高的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对其边际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

从外出就业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来看,收入最低的 5% 人群,一直从事非农工作对其收入的影响最大,与一直务农的居民相比,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务农居民的收入高出 77.36%。而收入处于 25%、50%、75% 和 95% 的居民,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比一

^① 参见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杜育红、孙志军:《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管理世界》2003 年第 9 期。

直务农居民的收入高 55.14%—63.27%。这一结论与实际较为吻合,民族地区低收入群体资本积累较少,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其主要依靠外出就业来提高其收入水平。工作经验对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正向影响较大,而对高收入阶层收入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

工作经验每增加 1 年,对收入处于 5%、25%、50%、75%、95% 的居民的收入能够分别增加 8.76%、3.48%、3.40%、2.78% 和 2.75%。即工作经验对低收入阶层收入的边际影响较大,而对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边际影响较小。在各收入组中,男性的收入水平均高于女性的收入水平,其中,在 95% 收入分组中,其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距最大,女性收入比男性收入低 22.76%,其他各收入分组中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距保持在 18.27%—20.69% 之间。

表 3 基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名	5%	25%	50%	75%	95%
教育年限	0.0674*** (0.0198)	0.0712*** (0.0113)	0.0652*** (0.0095)	0.0488*** (0.0100)	0.0384** (0.0187)
一般(对照组:身体健康)	-0.4204*** (0.1399)	-0.1794* (0.1004)	-0.1919*** (0.0655)	-0.1717* (0.0887)	-0.1349 (0.0952)
不健康(对照组:身体健康)	-0.4451 (0.3535)	-0.4731*** (0.1306)	-0.3859*** (0.1055)	-0.3796*** (0.0994)	-0.3283* (0.1859)
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 (对照组:一直务农)	0.0082 (0.0830)	0.3077*** (0.0961)	0.3805*** (0.0819)	0.4220*** (0.1093)	0.1742 (0.1504)
一直从事非农工作 (对照组:一直务农)	0.7736*** (0.0863)	0.5662*** (0.0835)	0.5514*** (0.0692)	0.6327*** (0.1098)	0.5584*** (0.1635)
能听懂,但不会说 (对照组:能听懂,也会说)	-0.1172 (0.0956)	-0.1273* (0.0715)	-0.1282 (0.0874)	-0.0991 (0.1199)	-0.0298 (0.1339)
听不懂,也不会说 (对照组:能听懂,也会说)	-0.4122** (0.1932)	-0.2709 (0.1929)	-0.2549 (0.1723)	-0.3525*** (0.0874)	-0.7709*** (0.2663)
工作经验	0.0876*** (0.0172)	0.0348*** (0.0111)	0.0340*** (0.0108)	0.0278*** (0.0103)	0.0275 (0.0170)
工作经验的平方	-0.0020*** (0.0003)	-0.0009*** (0.0002)	-0.0008*** (0.0002)	-0.0006*** (0.0002)	-0.0005 (0.0003)
性别(对照组:男性)	-0.1915 (0.1302)	-0.1827*** (0.0562)	-0.1828*** (0.0583)	-0.2069*** (0.0701)	-0.2276** (0.1002)
政治面貌(对照组:中共党员)	-0.1354 (0.1685)	-0.0619 (0.0802)	-0.0566 (0.0747)	-0.0913 (0.0969)	-0.0954 (0.1897)
民族(对照组:汉族)	-0.2505** (0.1236)	-0.3749*** (0.0584)	-0.3205*** (0.0539)	-0.2821*** (0.0893)	-0.5014*** (0.0871)
家庭规模	-0.0992*** (0.0286)	-0.0832*** (0.0214)	-0.0714*** (0.0195)	-0.0788*** (0.0253)	-0.0776*** (0.0211)
常数项	8.0186*** (0.6328)	9.4068*** (0.2533)	9.7305*** (0.2563)	10.5721*** (0.4266)	12.0231*** (0.6107)
Pseudo R ²	0.1482	0.1536	0.1535	0.1182	0.1309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对应的标准差。

(三)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居民主观经济评价的影响

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除了可能对居民的收入等客观因素产生一定的影响外,还可能影

响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经济感受。问卷中包括 3 个与收入相关的主观评价：一是居民自己认为目前自家经济收入在当地处于什么水平，选项将居民的主观感受分为 5 个等级，依次为下等水平、中下水平、中等水平、中上水平和上等水平；二是与 5 年前相比，居民认为其收入水平有什么变化，其选项依次为下降很多、略有下降、没有变化、略有上升和上升很多；三是预计未来 5 年收入水平有什么变化，选项依次为下降很多、略有下降、没有变化、略有上升和上升很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见表 4。

表 4 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

变量名	变量解释	样本量	占样本的比例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目前家庭经济收入处于什么水平	下等水平=1	471	16.10%	14381	9000	22454
	中下水平=2	834	28.51%	19083	10000	21320
	中等水平=3	1377	47.08%	32589	13000	271899
	中上水平=4	217	7.42%	46635	20000	97693
	上等水平=5	26	0.89%	102660	47777	213949
与 5 年前相比,收入水平有什么变化	下降很多=1	23	0.77%	15089	9555	16919
	略有下降=2	63	2.10%	20263	10000	25326
	没有变化=3	247	8.22%	16925	10000	18162
	略有上升=4	1334	44.39%	27696	10100	274395
	上升很多=5	1338	44.53%	29196	13000	63774
预计未来 5 年收入水平有什么变化	下降很多=1	16	0.61%	23402	10000	25049
	略有下降=2	42	1.61%	26773	20000	33400
	没有变化=3	159	6.09%	19658	10000	20860
	略有上升=4	1383	52.95%	28335	10000	270195
	上升很多=5	1012	38.74%	29851	15000	67478

注: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均为各变量对应的收入数据,其单位为元。

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目前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来看,民族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认为其家庭目前的经济状况处于中等水平,而处于下等水平或上等水平的比例相对较低。其中,认为目前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下等水平的居民占样本总量的 16.10%,认为经济状况处于中下水平、中等水平和中上水平的比例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28.51%、47.08%和 7.42%,认为其经济状况处于上等水平的居民占样本总量的 0.89%。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过去 5 年自家经济状况变化的主观感受来看,有 2.87%的居民认为其经济状况有所下降,有 8.22%的居民认为其经济状况没有变化,有 88.92%的居民认为其经济状况有所上升。这表明民族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认为过去 5 年其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未来 5 年变化的趋势来看,有 2.22%的居民认为未来 5 年其经济状况将会下降,有 6.09%的居民认为未来 5 年其经济状况将没有变化,有 91.69%的居民认为未来 5 年其经济状况将有所上升,这表明民族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对未来自家经济状况保持乐观的心态。

从回归结果来看,收入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其对过去 5 年来自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 5 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越高。身体健康状况也影响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与身体健康的居民相比,身体状况一般和身体状况不健康的居民认为其过去 5

年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 5 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均显著低于身体状况健康的居民。教育年限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 5 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居民对过去 5 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现实基本相符,居民在接受教育期间直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且接受教育还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因此,居民在接受教育期间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之后其家庭经济状况往往会加速改善。

表 5 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居民主观经济评价的有序 Logit 模型

变量名	目前的经济状况	过去 5 年来自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	预计未来 5 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
收 入	0.4261*** (0.0434)	0.2626*** (0.0432)	0.1738*** (0.0472)
教育年限	0.0104 (0.0139)	-0.0240* (0.0141)	0.0087 (0.0155)
一般(对照组:身体健康)	-0.6244*** (0.1276)	-0.3753*** (0.1276)	-0.6748*** (0.1454)
不健康(对照组:身体健康)	-0.3173** (0.1535)	-0.4808*** (0.1555)	-0.6379*** (0.1794)
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 (对照组:一直务农)	-0.2611** (0.1049)	-0.2806*** (0.1071)	0.0913 (0.1173)
一直从事非农工作 (对照组:一直务农)	-0.4005*** (0.1373)	-0.5168*** (0.1388)	-0.1398 (0.1524)
能听懂,但不会说 (对照组:能听懂,也会说)	-0.0749 (0.1098)	0.1286 (0.1126)	-0.2492** (0.1233)
听不懂,也不会说 (对照组:能听懂,也会说)	-0.3058* (0.1769)	-0.6642*** (0.1778)	-0.5748*** (0.1966)
年 龄	0.0001 (0.0015)	0.0008 (0.0016)	-0.0006 (0.0018)
性 别(对照组:男性)	0.0791 (0.0924)	-0.1972** (0.0937)	-0.1112 (0.1028)
政治面貌(对照组:中共党员)	-0.1755 (0.1290)	-0.1470 (0.1326)	-0.1985 (0.1439)
民 族(对照组:汉族)	0.2666** (0.1115)	0.0820 (0.1138)	0.2692** (0.1271)
家庭规模	0.1235*** (0.0267)	0.1094*** (0.0283)	0.1082*** (0.0300)
LR	183.61***	125.43***	106.01***
样本量	1937	1985	172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对应的标准差。

外出就业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相比较

而言,一直在家务农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较高;而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次之;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最低。其可能的原因:一是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二是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工作往往需要背井离乡,会牺牲部分与家人及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其主观满足感也相应降低。

居民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影响其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相比较而言,能听懂,也会说普通话的居民认为其过去5年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5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均更高;能听懂,但不会说普通话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次之;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最低。这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掌握普通话是非常必要的,普通话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掌握普通话可以大幅提高居民的收入,从而间接提高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二是掌握普通话的居民更容易获取信息,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更容易融入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故其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也更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3—2015年度城乡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状况、外出就业及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每多接受1年教育,其收入将增加5.6%;与自我感觉身体健康的居民相比,自我感觉身体状况一般的居民的收入低22.24%,自我感觉身体不健康居民的收入比自我感觉身体健康居民的收入低42.94%。与民族地区农村一直务农的居民相比,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务农居民的收入高33.49%,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比一直务农居民的收入高61.87%。与能听懂,也会说普通话的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相比,能听懂,但不会说普通话的居民的收入要低11.98%,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的居民的收入要低29.68%。工作经验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显著低于汉族,家庭规模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不尽相同。收入较低的居民,其身体健康状况对其收入的边际影响相对较大;而收入较高的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对其收入的边际影响相对较小。对于教育而言,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相对较高,而高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相对较低。这表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更加有利于低收入阶层,教育有利于缩小民族地区农村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外出就业能显著提高民族地区农村所有阶层的收入水平,其中,收入处于最低5%的居民,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比一直从事务农工作居民的收入高出77.36%,而收入处于25%、50%、75%和95%的居民,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比一直从事务农工作居民的收入高55.14%—63.27%。工作经验对低收入阶层收入的边际影响较大,而对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边际影响较小。

(3)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来看,83.9%的居民认为目前家庭经

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88.92%的居民认为过去5年其家庭经济状况有所上升,91.69%的居民认为未来5年其经济状况将有所上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越好,其对过去5年来自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5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就越高;相反,收入水平越低,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越不好的居民,其对过去5年来自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5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就越低;教育年限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5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居民对过去5年经济状况改善程度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出就业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相比较而言,一直在家务农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较高;而务过农,也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次之;一直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评价最低。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民族地区要继续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特别要重视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尽可能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以继续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的教育质量,增加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保障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但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且可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第二,努力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从制度全覆盖到人群全覆盖,衔接好医疗保险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一步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充分保障民族地区农村全体居民的身体健康。

第三,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普通话水平。普通话作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掌握和用好普通话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因此,在母语为非汉语的民族地区,应大力推进双语教学,使居民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语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

第四,促进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破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障碍,使城乡居民可以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民族地区居民跨城乡、跨区域自由流动提供制度和服务保障,以保障城乡居民教育收益的均等化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责任编辑 马 骅〕